

内 容 提 要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以霍英东为代表的粤商令世界瞩目；往前追溯，有清末马应彪带头建立的四大百货公司；再往前，则有洋务运动中的唐廷枢、徐润等著名买办；继续上溯，便是全球闻名的广州十三行。无疑，那时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

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中国对外贸易的澳门—广州二元中心的确立，到清咸丰七年（1857）广州十三行被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彻底焚毁，在古代中国与世界大航海时代接轨的300年间，广州十三行经历了从禁海到开海，从禁洋到开洋，从“加一征收”到取消恶税，从“一口通商”到鸦片战争，从“万邦来朝”的朝贡贸易到全球化市场贸易的历史变迁。在此期间，“银钱堆满”的广州十三行成为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子银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谱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华彩乐章。

本书全方位展开有关广州十三行历史的各个层面，从物质、制度到文化、精神，从皇帝、封疆大吏、海关监督到行商，从英、法、美等国官员到外商，从银圆的流入到逆转，等等，予以钩沉、考证，在前人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大量的中外史料，提出了一系列学术创见，写成一部广州十三行史。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张磊称许作者“既有纵考，又有横览；不拘陈说，勇于立言”。本书史论结合，编年史与专题研究相得益彰，力求可读性与学术性双佳。

作者简介



谭元亨，1947年12月30日出生于广东四会大沙镇三界市，祖籍广东顺德龙江南坑村，成长于广州与湖南湘潭。

祖上为广州“十三行”八大家“潘卢伍叶谭左徐杨”的谭家，谭家后来侨居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上世纪初其祖父返回顺德龙江南坑，1949年出任南顺桑园围董会副董事长。

谭元亨1968年上山下乡到湖南酃县（今炎陵县）。1963年创作长篇小说《幼苗》，1971年创作长篇小说《山花烂漫》。《山花烂漫》以集体创作的名义改编为花鼓戏《新教师》，旋即又被改编为湘剧《园丁之歌》并拍摄成戏曲电影。

1973年作为《园丁之歌》原作者成为湘潭市京剧团专业编剧，不久因《园丁之歌》被审查下放劳动，1976年8月身陷囹圄，1979年出狱。旋即创作有《一个年代的末页》《抓来的老师》等名作。80年代任湘潭市文联文学专干，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历任省市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作协副主席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国际IRSLC会员。

1990年调回广州，任职广州师范学院，并任儿童文学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调入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并任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是原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客属海外联谊会顾问，广东省广府人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广府学会会长（执行）。是著名的客家学学者，也是“广府学”的创立者，在海内外享有广泛声誉。获大雅风文学奖等国际奖2项，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骏马奖、中国图书奖等国家级政府奖4项；全国性奖5项，长篇电视剧奖及北京十月文学奖多项；“广东省热爱儿童奖章”等各类奖20余项；《客家文化史》近获全国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

已出版文史哲工各类著作逾200种，近5000万字，主要代表作有理论系列作品《元亨文存》（6卷）、长篇系列作品《谭元亨文集》第一辑12卷及《谭元亨自选集》。理论著作《中国文化史观》《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广府寻根》《客家圣典》《城市建筑美学》等40多部。文学著作《客家魂》（三部曲）《后知青·女性三部曲》《开洋》等40余种。纪实与史传《无效护照》《潘氏三兄弟》《东方奥斯维辛》《十三行世家》《十三行史稿》（三卷）《无声的虐杀——侵华日军粤港细菌战调查报告》等30余种。以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合著本“珠三角水利灌溉工程系列作品”《桑园围史话》《甘竹滩史话》《横琴中心沟史话》等。其作品有的被译为英、法、日、朝等多国文字。曾应邀到欧美、亚非十多国作中国文学、客家文化讲演。

除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外，还有《客家女》《客家人》《国门十三行》《正道沧桑》《中华民族风情录》等数百部（集）电影、电视作品及若干戏剧艺术作品。另有译作数部。



广州洲头咀海轮巨锚（作者摄）



18 世纪的珠江码头



中国古代的海盗船



18 世纪外销瓷上的中国船



18 世纪广州十三行商馆玻璃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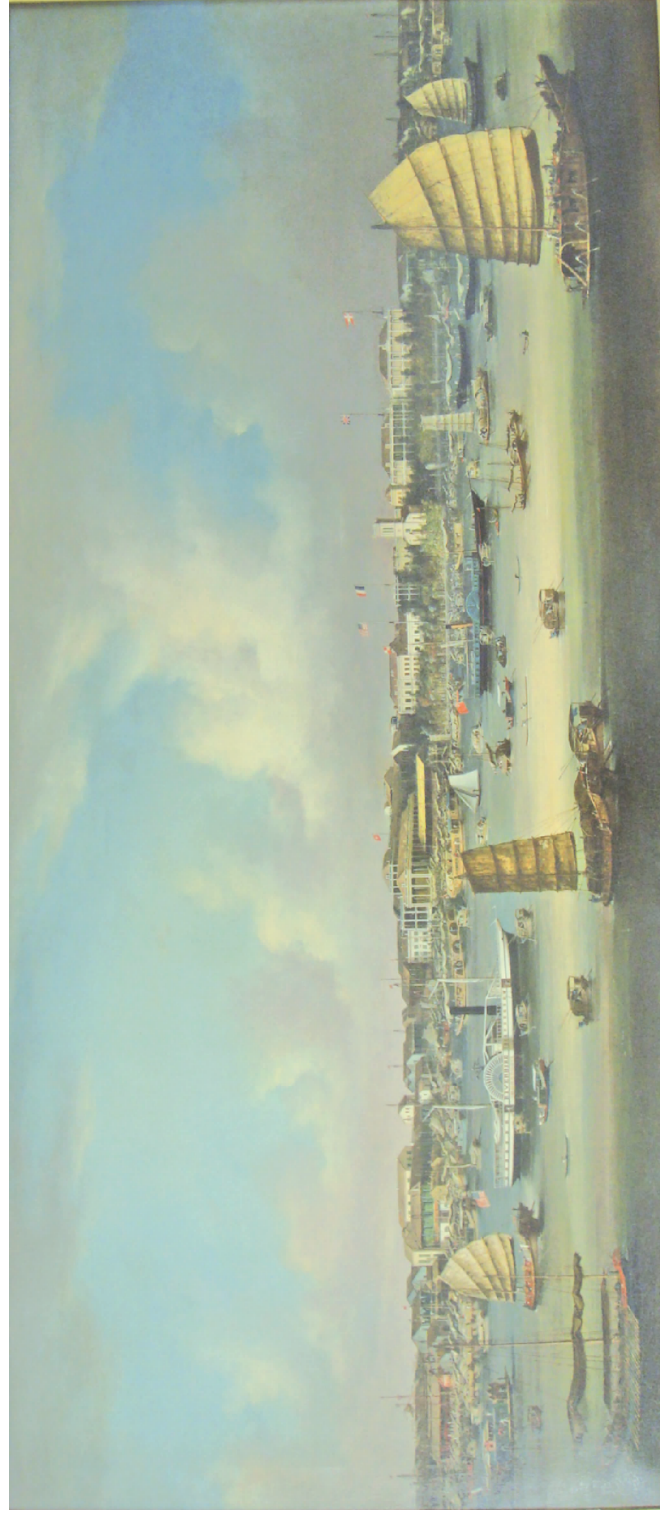
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的建筑



18 世纪澳门南湾风景



18 世纪广州黄埔锚地



18世纪广州珠江与十三行商馆

目 录

代序 贸易大国的光荣与挫折	周牧之 I
自序	I

编前 大航海时代 (明正德十四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 1519—1684)

小引	3
----------	---

卷一 浪白澳—澳门—广州“交易会”	7
第一章 市舶司、怀远驿与牙行的历史演绎	7
第二章 屯门之役：热兵器替代冷兵器	13
第三章 浪白澳：明代最早的中外交汇的商港	25
第四章 十三行渊源新考	31
第五章 十三行：“平交易”——自由贸易	42
第六章 澳门：十三行外港的形成	46
第七章 广州“交易会”：澳门—广州二元中心的产生	54

卷二 禁海与朝贡	64
第八章 帝国的怯懦与禁海浩劫	64
第九章 精心策划的献媚绝招	74

上编 开海时期 (清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 1684—1757)

小引	87
----------	----

卷三 从开海到禁洋	92
第十章 康熙开海：顺应大航海时代	92
第十一章 活跃在南洋上的中国商船	99
第十二章 法国“安菲特立特号”及中法关系的“蜜月”	108
第十三章 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与公行	117
第十四章 早年不同背景的官商：“你方唱罢我登场”	123
第十五章 皇商退出：官商的最后“身影”	128
第十六章 行商的民商本质	133
卷四 从禁洋到开洋	141
第十七章 康熙老矣：颁布“南洋禁航令”	141
第十八章 “夷馆”的建立和规则甫立	146
第十九章 身隐市廛的诗人行商	152
第二十章 “广州制度”与十三行	156
第二十一章 禁洋期间出现的锦纶会馆	167
第二十二章 雍正：从恪守祖制到再度开洋	172
第二十三章 封疆大吏对清代外贸的作用与影响	180
卷五 “统一”税项	182
第二十四章 十三行税制的沿袭与变化	182
第二十五章 广东巡抚与两广总督的互招	186
第二十六章 杨文乾“统一”税项	190
第二十七章 抗拒“加一征收”：对朝贡贸易的冲击	195
第二十八章 锲而不舍：大班的再度上诉	203
卷六 市场秩序的形成与维护	210
第二十九章 官商勾结，营私舞弊	210
第三十章 告洋状的行商之三次牢狱之灾	220
第三十一章 “帝国”的面子	223
第三十二章 雍正雷霆出击	232
卷七 恶税终结	237
第三十三章 乾隆登基后的开放与优惠政策	237
第三十四章 根本对立的两个商业集团	245
第三十五章 黄埔港口“西洋一景”	248
第三十六章 茶叶、丝绸、陶瓷——行销世界的商品	250

卷八 “禁洋”再议	263
第三十七章 “红溪事件”与“禁洋”之议再起	263
第三十八章 “天子南库”	272
第三十九章 “哥德堡号”的磨难、沉没与“复活”	285
第四十章 十三行第一家族——潘家	292
第四十一章 《红楼梦》《蜃楼志》与十三行	306
第四十二章 海洋文明与行商的族群构成	313

上编结语 十三行：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子银行”	320
------------------------------	-----

中编 “一口通商”时期 (清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九年, 1757—1839)

小引	329
----------	-----

卷九 限关：“一口通商”	331
第四十三章 “一口通商”：开放的逆转	331
第四十四章 “否定之否定”：禁—开—限	343
第四十五章 从两广总督到闽浙总督：杨应琚对“限关”的推动	347
第四十六章 行商的承担：不堪重负的自由贸易的近现代转型	351
第四十七章 “天朝体制”下的十三行制度	357
第四十八章 十三行与晋商、徽商的兴衰比较	362

卷十 公行兴废	366
第四十九章 公行组织重新浮出水面	366
第五十章 显与隐：两个“十三行”	372
第五十一章 广州：坐北朝南的地理优势	380

卷十一 金融之战	386
第五十二章 独立与封锁：美国“中国皇后号”与“大土耳其号”	386
第五十三章 “八大家”之杨家最后的闪现	399
第五十四章 乾隆卖官与行商的“顶子”	407
第五十五章 “嫩实兹号”：战祸与鸦片之合谋	414
第五十六章 银圆逆差与鸦片贸易凸现	423
第五十七章 商欠：如履薄冰	428
第五十八章 来自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祝寿船队	447
第五十九章 诡异的“海王星号”：西方的“治外法权”	462

第六十章 铄羽而归的沙俄“希望号”	470
第六十一章 17 世纪 90 年代，行商的分化与重组	477

卷十二 山雨欲来..... 486

第六十二章 中国的十三行商船	486
第六十三章 行商入祀：不能见容于世	494
第六十四章 儒商花园、家国情怀与士人	507
第六十五章 一“叶”知秋：全身而退	518
第六十六章 文澜书院与行商家族“由商入仕”	538
第六十七章 十三行制度生成的岭南文化基因	548
第六十八章 十三行行数及“八大家”考	553

中编结语 “走出去”：广州十三行参与大航海时代的国际贸易、 金融的研究	564
--	-----

下编 鸦片战争时期 (清道光十九年至咸丰九年, 1839—1859)

小引	575
----------	-----

卷十三 公司与公行同归于尽..... 580

第六十九章 焚衣自咎：1822 年匝地大火	580
第七十章 大火后清廷行商的“试办”新规	586
第七十一章 历史躲不开的剑与火	597
第七十二章 寿终正寝的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的制度“比拼”	601
第七十三章 鸦片加炮舰	607
第七十四章 “以茶制夷”	620
第七十五章 行商参加抗击外来侵略	641
第七十六章 时人对行商的评价	648
第七十七章 “东方远征军”：南方得不到，上北方要	659

卷十四 历史的沉疴

第七十八章 太平洋铁路：行商资金与劳工血汗	670
第七十九章 “王罗号”事件：站不住脚的战争借口	675
第八十章 不堪忍受的屈辱与苦难	683
第八十一章 十三行命运与民俗演变	687

下编结语 穿透历史的创伤与警示	699
-----------------------	-----

编后 后十三行时期 (清咸丰十年至 21 世纪, 1860—21 年纪)

小引	709
----------	-----

卷十五 十三行的前世今生	713
--------------------	-----

第八十二章 余绪：道台与买办	713
第八十三章 不仅仅是家族的失忆	723
第八十四章 十三行后人的文化修养	727
第八十五章 不堪涕泪说山河	739
第八十六章 400 年后的广交会：十三行的“今生”	759
第八十七章 十三行的文化资本与广州的城市格局	763
第八十八章 广州：从十三行到城市博物馆的呼唤	766
第八十九章 百年十三行研究学术简史	770

终卷结语 重返中国史学的传统	778
----------------------	-----

广州通商大事记	782
---------------	-----

参考文献	812
------------	-----

后记	819
----------	-----

代序 贸易大国的光荣与挫折

周牧之

200年前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经济体，以茶叶为首的中华物产成为英国人的必需品，导致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最终引发鸦片战争。更不幸的是，此后中国陷入被列强围攻掠夺的积贫积弱之中。

200年后的今天，中国再一次登上世界最大贸易国的宝座，成为全球上百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与200年前一样，巨大的贸易顺差也引发了诸如“中美贸易战”之类的反噬。但与两百年前不同的是，今天中国一边开放，一边改革，一边融入世界，正在着力成为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格局巨变的强大国家。

在这个时刻，总结、回顾和反思200年前贸易大国的光荣和挫折，对思考当今中国的发展之路有着切实的现实意义。谭元亨教授所著的《十三行史稿》正是这样一部大作。十三行前后300年，始于葡萄牙人的广州—澳门贸易中心（1557年），终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是当时中华贸易大国的标志性存在。《十三行史稿》立意高远，而且“用力甚勤，掘发甚广”。承蒙谭教授的厚爱能以旧作充当代序，实乃荣幸之至。

大航海第一次把世界连为一体，不仅让西方国家发现并殖民了美洲大陆，更使西方国家能够与欧亚大陆富饶的东方直接进行东西贸易，全球格局为之巨变。

大航海虽然让东南亚、印度相继沦为殖民地，但是大规模的东西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出口贸易利益，致使中国鼎盛一时，直到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最终引发鸦片战争，使中国遭受来自西方的致命一击。从此中国国力迅速衰落，列强蜂拥而至，疯狂地榨取中国的社会财富，沉重地打击中国经济，破坏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一、茶叶：让世界帝国沦为对华贸易赤字大国

东方物产给欧洲带来一个重要的新需求——茶叶。大航海从美洲和亚洲给欧洲带来了玉米、大米、土豆、茶叶等过去欧洲没有的食品和饮料。这些物资引发了欧洲饮食结构的巨变。旺盛的需求使茶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贸易商品。

在茶叶原产地中国，人们很早以前就形成了饮茶的习惯。虽然早在宋代，茶叶就传到了日本，但在大航海时代，茶叶的主要出口产地仍然局限在中国。由于茶叶中的成分能够促进肉食消化、补充维生素，茶叶在以肉食为主的欧洲很快流行起来，特别是在英国更是成为国民饮料。

然而由于茶叶的主要生产地限于中国，中国掌握了茶叶贸易的价格决定权，这给 18 世纪的英国带来了大难题。昂贵的价格使英国需要支付巨额的贵金属用以购买大量茶叶。

为了贩卖毛织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在 17 世纪后期就来到了中国。但是与英国人的期待背道而驰，毛织品在中国没能找到销路。相反，中国茶叶在英国引发了旺盛的需求，英国的对华贸易此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当时英国虽然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棉制品和陶瓷器等物产，但本国产品在中国却找不到销路，英国的对华贸易长期陷入结构性的巨额逆差。对华贸易的巨大赤字使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每年需要向中国支付大量白银。持续的白银流出最终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但此时英国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茶叶。

生活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生活中同样离不开茶叶，因为茶叶的成分对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来说，能够促进消化、补充维生素。因此在中国，茶马贸易一直是维系农耕地带与游牧地带重要的经济纽带。

茶叶最先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7 世纪初贩卖到欧洲，17 世纪 60 年代茶叶出现在伦敦市场并开始上税。像生活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一样，茶叶很快成为以肉食为主的英国人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产品，饮茶在英国成为一种时尚。

欧洲各国原本大多拥有各自的国民饮料，比如法国、意大利是葡萄酒，德国是啤酒，恰好英国没有自己原本的国民饮料。此外，欧洲各国的水质大多不好，不适合沏茶，而英国的水质比较适合沏茶。种种偶然因素使然，饮茶在英国迅速普及。

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18 世纪 50 年代从中国出口至欧洲茶叶的总量达 10 万担左右，到 1783 年出口总量上升到 24 万担。其中大部分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进口，或者由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进口，再辗转到英国。

1784 年 8 月英国制定“减税法令”，取消了对茶叶征收的各项附加税，规定只征收 12.5% 的单一税。欧洲最大消费国对茶叶的减税进一步扩大了茶叶在英国的普及。到 1800 年，欧洲进口茶叶总量为近 30 万担，其中英国占比高达 77%。鸦片战争前夕的 1834—1838 年，中国每年出口茶叶的数量更是多达 45 万担，茶叶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贸易中最大的单项贸易品目。

饮茶在英国的普及带来了“饮料革命”，改善了英国人的生活品质和健康，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麻烦。因为茶叶的原产地在中国，虽说在英国已经普及了饮茶文化，但当时没有英国人见到过茶树，更不要说英国的气候不适宜种植茶叶。也就是说，英国把不是自己国家生产的，也不可能在自己国家生产的茶叶，普及成了国民饮料。为此，英国需要向中国长期、大量地购买这个必需品，更要命的是茶叶贸易的价格决定权还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

在 18 世纪，英国人除了茶叶以外还需要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等工业制品，但是在中国能够行销的英国制品只有钟表。然而钟表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市场，只限于有钱人的奢侈品。因此，中英贸易出现了长时间的、结构性的不平衡，巨额白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中国，英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对华贸易的赤字大国。

美洲新大陆流入欧洲的大量白银，曾经导致白银流通过剩，在欧洲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使大量白银持续从欧洲流向中国。到18世纪末期，在欧洲甚至造成了因白银短缺，引起财政危机的局面。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在18世纪成为困扰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个重大经济难题。

茶叶贸易的扩大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同时英国还要担心是否能够稳定地从中国进口到茶叶。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为茶叶贸易着实苦恼。相反，东西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国际贸易的扩大和贸易顺差的膨胀。茶叶、纺织品、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

当时出口的茶叶主要产自作为红茶生产地的福建省和作为绿茶生产地的安徽省。随着茶叶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两个茶叶产地的山区不断被开发成茶园，以茶叶为龙头的商品经济也迅速地繁荣发达。受到茶叶出口的刺激，广东地区的茶叶生产也逐渐兴盛。

伴随着茶叶出口的发展，不仅是茶叶的栽培，茶叶的收购、加工、运输等相关行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福建、安徽和广东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制茶厂，并相继涌现一批资本雄厚的茶商和著名的茶叶品牌。

除了茶叶以外，中国的丝绸出口量也不断增大。乾隆中期，出现了“苏州织机达一万余张，盛泽方圆二十五里之内织机达八千余张，杭州织机达三千余张，湖州织机达四千余张”的盛况。丝绸成为一大出口主力。直到18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一些国家采取了限制纺织品进口的政策，中国对欧洲的丝绸出口才有所减少。

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出口在这一时期也非常旺盛。致使雍正、乾隆年间，“瓷都”景德镇“窑二三百区，业陶数千户”，景气空前。

来自欧洲的旺盛需求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相关产业的兴盛和城镇的发达。在这一时期，中国是东西贸易巨大的受益者。

二、朝贡还是条约：国际关系体系的冲突

为终结“三十年战争”，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此后在欧洲确立了以条约来规范两国或者多国间关系的国际关系体系，也就是所谓国际关系的“条约体系”。

随着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增大，英国政府对于没有与中国缔结任何条约来保证茶叶贸易的状况越来越感到不安。1793年7月英国政府派出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团抵达中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目的就是与中国签订条约以确保茶叶贸易的稳定。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与条约体系完全不同的对外关系体系，也就是所谓“朝贡体系”。通过朝贡与册封，中国的王朝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一个宗主国和属国构成的政治经济关系体系。属国的君主向中国定期派遣朝贡使节，献纳朝贡品。对此，中国皇帝回赐朝贡国君主中国物产，同时允许朝贡国与中国进行一定的贸易，这种贸易体制被称为“朝贡贸易”。

以缔结条约为来华目的的马戛尔尼使团被视为对朝贡体系的挑战。与朝贡使节一样，在热河行宫晋见乾隆皇帝时，该使团被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由于马戛尔尼拒绝，

使团与清政府之间发生了争执。最后在乾隆皇帝显示的“大度”之下，妥协为允许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行单膝下跪礼，免去叩头礼，马戛尔尼才得以在1793年9月14日实现了晋见。

关于晋见礼仪的争执实际上是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之间两种不同性质国际关系体系对立的象征。虽然实现了晋见，但马戛尔尼却没有能够达到与中国缔结条约的目的。

1816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了第二个使节团，也就是所谓的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使节团。对于阿美士德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又没拿出乾隆皇帝般的“大度”，致使阿美士德使节团最终没能够晋见到皇帝，缔结条约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中英虽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交往，但由于国际关系体系性质的截然不同，两国之间无法实现正常对话。

三、鸦片中毒的中国与鸦片贸易中毒的英国

英国亚洲贸易的初期主要是从印度进口棉织品，从中国进口茶叶。印度的棉织品和中国的茶叶给英国带来了一场“生活革命”，提高了英国人的生活质量，饮茶和穿棉织服装成为当时英国人新生活模式的象征。然而英国需要为此向中国和印度支付大量白银，棉织品进口同时也给英国的毛织品产业带来了巨大冲击。

为了替代进口棉织品，英国开始在美洲的西印度群岛种植棉花，再将棉花运往本国的曼彻斯特进行工厂化加工。这就是所谓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不仅一举解决了印度棉织品对英国产业的冲击，还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而过去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印度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产业革命并没有消解英国的对华贸易巨额赤字。英国人为了改变茶叶贸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采取了两个方略：一是通过在殖民地印度栽培鸦片并向中国走私出口，获取暴利，来补偿茶叶贸易的逆差；二是企图在印度等殖民地栽培茶叶，解除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压力。

在爪哇岛很早就有吸食鸦片的习惯，17世纪中叶通过与爪哇岛同样被荷兰人占领的台湾，吸食鸦片的习俗传入福建省和广东省。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向中国走私出口鸦片的不是英国人而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从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殖民港果阿将印度中部生产的鸦片运往澳门，再转卖到中国内地。在这一个世纪里，每年大约有200箱的鸦片流入中国，每一箱鸦片约为60公斤，相当于100名鸦片吸食者一年所吸食的鸦片数量，由此可以推算当时中国存在20000人左右的鸦片吸食者，主要集中在以福建和广东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的成本高昂，该公司每年有向英国本国送回大量资金的义务，同时还必须负担英国派遣的军队和行政人员的费用。但是从殖民后的印度向英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棉花和砂糖都销路不好。因为当时棉花和砂糖已经能够从美国南部、埃及以及西印度群岛进口，而且价格低廉。1820年以后，这些商品在英国的贩卖价格竟低于在印度的采购价格，东印度公司印度商品的出口贸易陷入赤字。

与此相反，该公司的中国贸易却繁盛非常，特别是从中国购买的茶叶在英国能够高

价行销。为此，东印度公司把需要从印度送往本国的资金迂回到中国采购茶叶，再运回英国高价出售，这条路径成为东印度公司增加收入的“黄金通道”。

从18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对华贸易的巨额赤字和增加印度经营的收益，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组织向中国走私印度生产的鸦片。鉴于当时清朝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害怕直接走私鸦片会对茶叶贸易产生不良影响，采取了通过散商（country trader）向中国走私出口鸦片的方式。所谓散商，是指从东印度公司获取了在亚洲进行贸易许可的英国和印度的商人，这些商人只能从事好望角和红海以东的贸易，不能进行英国本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直接贸易。散商从印度将鸦片和棉花贩卖到中国，虽然赚取了大量白银，但是东印度公司却禁止他们染指茶叶贸易，因此散商手中存有大量的白银。对此，东印度公司的广东财务局在广州对散商签发汇票，散商通过购买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签发的汇票可以在印度支取现金，免去了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

这里要说明的是，东印度公司广东财务局对散商所签发的汇票只能在印度兑现。对东印度公司而言，利用散商购买汇票的白银可以支付从中国购买茶叶的费用，而茶叶运到英国后又能获利甚丰。走私鸦片的散商变相地为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提供了丰厚的资金。

由此，英国的对华贸易形成了三角贸易体系：由散商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再从英国向印度倾销棉织品。

对英国而言，鸦片贸易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方略，它既可以弥补对华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赤字，又可以给失去了棉纺工业的印度带来经济上的补偿，减轻殖民印度的成本。但是，鸦片贸易的增大，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

18世纪末，每年流入中国的鸦片达到4000箱，相当于40万鸦片吸食者的年消费量。但是，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英国外相在给他的训令中明确指示：“如果中方要求禁止出口鸦片，接受中国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开拓在其他地区的鸦片贩卖市场。”这表明当时英国为了确保茶叶贸易的稳定，已经做出了停止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决定。同时也意味着英国不愿意放弃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在放弃对华走私鸦片后需要寻找新的贩卖市场，而且也认为能够找到400箱规模的替代市场。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执拗地要求马戛尔尼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却没有提出禁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要求，鸦片问题并没有成为当时交涉的议题。

从英国外相的训令可见英国人当时最重视的还是茶叶贸易，当然，4000箱鸦片的出口所带来的利益也不容忽视，如果失去中国这个鸦片市场，就必须开拓其他市场来弥补。然而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这一时期对华鸦片走私的数量大增，中英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中国鸦片走私进口量在1826年达到10000箱，1830年达20000箱，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竟达到40000箱，相当于400万鸦片吸食者一年的吸食数量。

中国鸦片市场的急剧扩大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茶叶贸易，而且以每年40000箱的进口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市场。巨大的利益使英国离不开对华鸦片贸易，正因为如此，英国才不惜用武力来捍卫这种在英国本土被禁止的走私贸易。

可以说，19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鸦片中毒状态，而英国也成为

一个已经不能放弃对华鸦片走私的鸦片贸易中毒国家。

美国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参与使对华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美国在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被禁止与中国进行贸易。1783年美国独立以后马上开展了对华贸易。

19世纪2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在英国伦敦诞生，出现了美国汇票。所谓美国汇票，是指以美国对英国的棉花出口作为债权发往伦敦的汇票。1830年以后，美国商人将美国汇票带到中国用于购买茶叶，英国散商也通过购买美国汇票获得了向伦敦汇款的手段。

英国散商通过购买美国汇票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独立，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角。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独占权被撤销，以散商为主的对华鸦片走私进入更加猖狂的时代。

到1827年前后，走私进口鸦片的价值已经超过了中国茶、丝、布匹等出口的总和，中英的贸易结构发生逆转，大量白银从中国向英国倒流。

四、鸦片战争：中国由盛转衰的节点

基于对鸦片贸易的危机感，清朝政府屡屡实施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政策，但却收效不大。中国的禁烟政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禁止鸦片走私进口的政策，一类是禁止国内的鸦片制造、贩卖、吸食和鸦片馆经营的政策。这两类政策在18世纪末期以后都没有能够起到控制鸦片吸食和走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18世纪长期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官僚腐败导致清朝政府的行政体制处于崩溃状态。

鸦片在禁烟政策执行者的官僚和军队中盛行，官员和军队人员经营鸦片烟馆的现象严重。实施禁烟政策最前线的广东官员和军队更是阳奉阴违，虽然声称严查鸦片走私贸易，但在收取贿赂的前提下默许了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走私鸦片需要向当地官员贿赂成为当时在广东的外国人之间的常识。

1837年，清朝政府以强制性手段实施了全面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禁烟强硬派钦差大臣林则徐没收了贸易商人手中的鸦片，并销毁于广东虎门。

但是此时的英国已经不能失去赖以改善对华贸易结构、能够获取暴利的鸦片贸易了。英国政府为了维护在本国被禁止的鸦片贸易，竟然派遣庞大的舰队远征中国，打响了鸦片战争。在工业革命后实力大增的英国舰队面前，几乎没有真正海军力量的中国不堪一击，英国舰队长驱直入，横扫整个东南沿海，所向无敌。中国在一瞬间被新兴工业国英国所击败。

1842年，在南京，清政府屈辱地签署了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向英国割让香港，承诺了英国人强要的贸易条件。中国从此被卷入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世界体制，国力迅速衰微，中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从1830年的29.8%迅速下降到1860年的20%、1900年的6.2%。以鸦片战争为界，中国从东西贸易的受益者一举沦落为工业革命的受害者。

由此，中国进入了苦难艰辛的近代历程。到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栽培茶叶的尝试也获得成功，中国不再是唯一的茶叶出口国。此后，中国茶叶的贸易条件急速恶化，茶叶的出口量也急剧下降。

五、对西方战略的严重缺位

在清朝早期，康熙帝对于如何稳定统治地位提出了“西师”和“南巡”的两大战略。“西师”是指将解除曾经困扰历代王朝的来自西部少数民族的威胁作为王朝的为政要务。为了稳定西藏、新疆和蒙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君主多次挥师出塞，平定叛乱。“南巡”是指全力安抚汉族士人、安定中华经济的中心之地。为此，康熙、乾隆两帝都曾几下江南。

自古以来，如何稳定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统治者的一大难题，许多王朝因为少数民族的叛乱、入侵而灭亡。在这一点上清朝应该说是历代王朝中做得最成功者。一方面，基于它本身就是东北部的少数民族，较容易与中原周边少数民族沟通；同时，康、雍、乾三代帝王战争与怀柔交替的“西师”战略也非常奏效，致使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鲜有的一个不需要长城而又疆土辽阔的王朝。另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清朝在战略上意识到对中原统治的成败取决于能不能得到汉族士人的支持和能不能控制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带。康熙的六次“南巡”和乾隆的六次“南巡”对安抚江南精英、笼络人心、稳定和发展经济、沟通南北往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84年，乾隆在最后一次“南巡”即将结束时发表的《南巡记》中也强调，继位50年来所做的两件大事就是“西师”和“南巡”。应该说康熙时期制定下来的这两大战略，通过康雍乾三朝具有连续性的实施，为“康乾盛世”营造了稳定的局面。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却始终没有能够针对西方势力进入东方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制定出应对的战略。虽然欧洲贸易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欧洲人的东进在宗教、领土、民族等各种层面上也不断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的麻烦，但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政府都没有能够认真地正视来自西方的机会与威胁。

相反，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却极富谋略性。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舰队在作战上准确地把握了中国防御上的弱点，避开林则徐守备的广东，北上占领舟山群岛，封锁宁波和长江口，继而再北上天津威逼北京，达到了胁迫清政府免去林则徐职务的目的。此后英国人为了在谈判过程中得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攻陷虎门炮台，相继占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乍浦，再攻掠上海以及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点的镇江，彻底瓦解了清朝政府持续战争的意志。

英国之所以能够如此准确地把握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弱点进行有效的攻击，是因为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节团来华时就偷偷测量了从广东到渤海的海域，经由大运河回程时又清楚地把握了大运河作为经济动脉的重要性。继马戛尔尼使节团之后，英国更是不惜余力地搜集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报，绘制了详细的中国海域图，整理了攻掠据点所需的情报。在开战之前，英国人甚至已经制订了一整套有关战后赔款金额和政治要求的计划。

与此相对照，清朝政府对欧洲的形势以及其在亚洲的贸易实态却严重缺乏了解。林则徐应该是清朝最先认识到西方信息重要性的官员，他曾经让人将1834年在伦敦出版的《地理学百科字典》翻译成《四洲志》，让其好友魏源调查世界形势。魏源后来将收集的